

12102

第八卷

81

# 淮上人物

趙樣初題



47239/119

# 淮 上 人 物

(淮南文史资料第八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南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87年12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戎马倥偬前半生 .....            | 廖传枢 ( 1 )       |
| ( 附 ) 武汉市负责同志在廖传枢追悼会上的悼词 |                 |
| 风雨沧桑六十秋 .....            | 廖 麟 ( 57 )      |
| 王绍九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 .....       | 王金澄 ( 98 )      |
| 廖宜民事略 .....              | 光达、国光 ( 103 )   |
| 辛亥革命烈士后代廖多芳 .....        | 廖乐群、顾明清 ( 119 ) |
| 倪荣仙其人 .....              | 大通区政协 ( 123 )   |
| 回忆先父倪荣仙 .....            | 倪望英 ( 131 )     |
| 难忘的岁月 .....              | 高 曙 ( 140 )     |
| 坎坷的历程 .....              | 杨从虎 ( 154 )     |
| 廖宜民手迹 .....              | ( 插页 )          |
| 第七辑订正一则 .....            | ( 202 )         |

# 戎马倥偬前半生

廖传枢



**提要：**廖传枢，淮南人，黄埔军校六期毕业，曾任国民党第十五军少将参谋长，1949年12月，随部在四川成都起义。解放后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、武汉市政协常委、民革武汉市委顾问。1987年3月逝世。此篇回忆录系廖传枢同志的遗文。主要内容有：一、学生时代；二、军旅生涯伊始；三、讨伐福建人民政府；四、在陆军第二师；五、参加抗日战争；六、所

谓湘北第一次大捷的真象；七、开始投入内战；八、实现和谈，争抢承德；九、秀水河子之战；十、在苏军撤离沈阳后，进攻抚顺；十一、夺取本溪的前前后后；十二、1946年秋，夺取安东（丹东）、第二十五师被歼灭的经过；十三、企图侵入浑江市（八道江）地区的失败；十四、1947年秋冬的厄运；十五、1948年军事意识纷乱，蒋介石因忿决战，加速崩溃；十六、再作冯妇。

1910年4月21日（农历庚戌宣统二年三月十二日），我出生于凤台县东乡廖家湾村（今属淮南市）的一个小康之家。有四个哥哥、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

## 一、学 生 时 代

我五岁时进村塾，发蒙老师吴庆庭（名元吉。灵璧人，晚清秀才）。翌年，村塾改为国民小学校，我又读了四年。毕业后，到黑泥洼以南二里的牛家庙高级小学续读，两年毕业。1922年春，随族侄廖运周去怀远县，考入含美中学（美国教会长老会所办），读了一年初中。在幼稚的心灵中，突然蒙发出模模糊糊的民族意识，对基督教的宗教宣传及美国人主宰校务的现象，感到厌恶。1923年春季开学时，偕廖庆吉、朱明让到了学校，这天夜间，明月映窗，三个十三、四岁的孩子都不能入睡，乃起坐而谈，不想再读下去，决定天明之后，乘原船返里。回家后旷学半年，下半年请王馨村先生补习功课，准备去南京考学校。

1924年春，偕廖庆吉到了南京，考入安徽公学，一起插班初中二年级。该校为陶知行（后改名陶行知）所办，订有校风十三条，对学生学习要求和生活管理都比较严，颇具特色。校内准许售卖《醒狮报》（国家主义派的刊物）等刊物，邀请过熊希龄、高士读、吴丙湘、方振武、黄炎培、胡适之等人到校演讲。学校独树一帜，与当时江苏省立一中和钟英、成美、东方等中学，颇有至死不相往来之概。江、浙战争时（齐燮元与卢永祥），南京各学校迫于战火威胁，纷纷要求放假疏散。陶知行校长自北京电告学校：“贮购煤米。子弹打到黑板上，亦不停课。”陶先生藐视内战，以至于此。

北伐战争开始后，南北两军在津浦路江淮之间形成拉锯

战。兵荒马乱，道路阻塞，上学读书，困难重重，加上农村经济凋蔽，家庭无力供应我上学。我原打算中学毕业后，报考医科大学，将来以行医为终生职业，服务社会，由于上述原因，已不可能。因此，高中读了两年，只得另作打算。

1928年春，适逢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最后一次招生。我与寿凤诸青年，经方振武部驻南京办事处（处长史蕴朴，上尉书记刘兴汉）帮助，以该部少尉军官名义报考，免除了入伍生教育阶段，被分配到炮兵大队二中队学习。这时蒋介石下野，尚未复职，由杨杰代理校务。新年时杨杰被学生捆打，情形有些混乱。五月份，蒋介石复职后返南京，先后派张治中任教育长，王柏龄、王佑愈分任训练和教导部长，同时进行国民党党员登记，我就是在这次登记之后，成为国民党正式党员的。

同年秋，由王柏龄提议，成立要塞炮兵班，为长江下游各要塞炮台造就干部。从炮兵大队、工兵大队考录学生五十名，以上校教官王宇章（黑龙江人，日本留学生）为班主任，在南京乌龙山旧时的参将衙门内学习，并选派教官，主要教授战术、筑城、兵器三个科目。

1929年夏，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北京迁葬南京中山陵，举行奉安仪式。由各步兵大队选派学生五百人，组成仪仗队，担任迎柩、护卫等工作。

翌年，军校成立“留学预备班”，名为由学生报考录取，在班里补习外语和基础课，结果多为“八行”所推荐。后分别送到英、美、法、德等国留学，廖耀湘即在其内。

这时蒋介石为牢牢掌握军队，集军权于一身，强调统一军事教育，把李范一办的通信学校学生五百人，改编为军校第六

期的交通大队。李宗仁第七军的随营学校、第六军（浙军）的学生队等，也都统编到第六期各兵科。另外把原设在广州、长沙、武汉的各分校，一律统一在中央军校的体制下，蒋自兼校长。陆军大学各兵科的学校、空军学校等，蒋介石均兼任校长。

这样一来，第六期的学生人数最多，毕业离校的时间也各不相同。例如步兵第三大队，就有前第三大队、后第三大队之分。

## 二、军旅生涯伊始

1929年11月，我从要塞炮兵班毕业，被分配到江宁要塞司令部，免去半年见习期的例规，以少尉服务员的名义，在司令部听候派遣。要塞以狮子山、乌龙山炮台，起拱卫首都的作用，司令孙伯文（江苏宿迁人）。一天夜里，孙司令要我值班，任务是专守电话。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：当时蒋、冯、阎正在酝酿中原大战，蒋介石令石友三部开赴广东，石不肯，蒋即指使几位大员，将石邀到陈调元的公馆加以控制，使之暂时脱离自己的部队，以免发动叛乱。而石友三到陈公馆后乘机溜走，一时南京情况紧张。停泊在长江中的兵舰都脱去炮衣，严防石部由浦口渡江，狮子山炮台也奉命严阵以待。这时南京仅有冯轶裴的教导队数千人，匆忙开到浦口以北乌衣附近，向石部警戒，其他无可可用之兵。结果石友三部却未进攻南京，沿津浦路北退，一场虚惊才算过去。

不久孙伯文调任南京卫戍司令，遗缺由王谔继任。司令人员旧去新来，部下也更换了一大批。我被调到守备营任中尉排长，除轮流担任司令部的警卫外，没其他任务，死气沉沉。我觉得这样的部队，不是年轻人立身之所，但自己又毫无门路。

1930年春，蒋、冯、阎中原大战，各部队都开赴前方，我在南京无事可干，以看报刊消磨时光。是年十月，冯、阎败北，大战结束。一些同学随部队回到南京附近，谈起战斗情况，我深以偷安后方为可耻，遂决心转到战斗部队去。

1931年3月经同学章诚公介绍，到杭州投入独立炮兵第四团，任“观通排”中尉排长。这时炮四团配属陆军第四师，师长符庭瑶（无为人）治军严谨，事必躬亲，我在任职前须经他测试。测试合格后，预支薪饷，购置自来水笔、手表和黄卡几布马裤。凡第四师的干部，笔和表是必备的装备，官佐一律着灰色上衣和黄马裤，以别于其他部队。并规定军人不得与妇女同行，自己的妻、女亦不例外。这时的士兵逃风甚炽，连、排长常为此而苦恼。我即注意观察，寻找解决办法。到差后，首先和士兵生活打成一片，每天操课亲自讲授。排里的观通车，是从日本买来的，从无操典，也未搞过制式教练。我边操边记，很快编成操典草案，形成制式教练，士兵操练时感到很有兴趣。杭州地区春季多雨，不能出操，就教士兵识字、算术、应用文和电话机电路图等。晚上与士兵叙家常、讲故事。星期天准许他们请假外出。这样，安定了军心，士兵学习也有进步，逃风日渐消弥，团长孔庆桂认为我带兵有方。

是年7月，部队奉命开赴豫北，归刘镇华指挥，讨伐石友三。七月底，军次新乡，第一营已开始登车，即将开赴博爱县清化镇待命。第一连因有一个士兵病死，众人责怪中尉排长王纲（贵州人，军校七期）求医不力，把他打了一顿。一时车站蜂传发生兵变，秩序大乱。一连连长李寿芝无力处理。营长沈清（军校五期）声言，对肇事士兵必须惩办。。结果全连士兵脱下军衣，离队而去，一个不剩。团长孔庆桂闻讯，立即组织

团部传令兵十多人，到车站附近去找，并令他们晓喻士兵：责任尽归第三炮上士炮长一人，劝令士兵立即返队。果然除第三炮炮长外，余皆归来。而连长李寿芝、排长王纲，势必易人。将营附余鑫（湖北人，军校六期）调充连长，排长无人肯干，延至次日中午，军车开不出去。团长问我敢不敢去第一连当排长？我说：“敢！军人应临危受命，况且我和第一连没有宿怨。”团长即命我随沈营长到第一连报到。不少同学、同事责怪我冒失，不知利害，现在还未打仗，一连士兵竟如此反叛，将来把炮丢了，岂不杀头。我原带的一排士兵，都要随我到一连。我说：“你们想要我犯法？我带你们走，团长将办我拐带罪的。”连推带踢，把他们撵下车，开车出发。第二天清早，车到清化镇，第一件事就是擦拭武器。新连长为发擦炮布，引起士兵的不满。正当我走到擦炮场地，听见第六班班长高声说：“我看这位连长又是个肉头……”我心里一怔，心想这事不管不行，就高声责问他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马上立正，全场皆肃然无声。我说：“纪律必须遵守。有意见和我说，我可代为申诉。当着我骂连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承认讲错了。我让士兵们继续工作，结束了这场意外的小事。原来我们出发时，团长不放心，暗中派人察看情况，这件小事马上被报告上去，团长决定余鑫仍回任营附原职，第一连连长由我升任。

在清化镇驻了约一个月，军马的草料及军队的桌凳等生活用具，多由地方“支应局”免费供给，（给农民增加了很多负担）。由于蒋介石和石友三妥协，仗没有打起来，我们又开回开封，在南门外袁（世凯）家楼附近的空场，架设帐篷住下，准备迎接双十节阅兵典礼。

天气渐冷，我们抓紧时机进行训练，，实弹射击。我团用的三八式野炮配有照明弹，过去从未使用过，这次要进行演习，任务派给第一连。当地老百姓看见照明弹，惊呼“一炮打出一个月亮来”。照明弹的弹体重量与其他杀伤弹不同，射击诸元须加以换算，因缺乏现成的参考资料，经过查书和找人请教，终于完成任务。但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，我因年少气粗，忤怒了营长刘××（河南人，军校四期），以后被以藐视长官为名而撤职。

1932年上半年，因开封的部队调走一空，我们炮兵被派去守城门。城防交代后，开封城里曾发生一起刺杀案，崔邦杰（绿林人物）杀死了刘峙的参谋长彭启彪。当时闭城三天，搜捕凶手。而崔邦杰早已出城，窜归故里。刘峙在开封任河南省主席兼行辕主任，时人称之为“改造博士”。盖因他收拾杂牌武装，进行吞併。这次凶杀，就是争夺职位的恶果。

后炮四团奉命立即开往南京，准备参加上海抗战。为避开浦口法国兵舰的耳目（据说法国曾向日军供给情报），部队在滁州下车，经全椒由采石矶过江，到达南京。不知何故，我们并未继续开赴淞沪，就在南京驻下了。每星期一，干部都到军校参加“总理纪念周”，听蒋介石讲阳明哲学及曾、胡治兵语录。

1933年5月，部队奉命开到郑州，驻在胡公（景翼）祠。不久又经中牟县徒步回到开封，进行训练。这时我曾当过一次监斩官，将夜间潜入营部偷枪并经第四师军法处判处死刑的三个罪犯，在开封演武厅执行枪决。

为提高团里军士的素质，团长把我调为营附，专办学兵连。学兵连由各连抽出军士的半数编成，从锻炼身体到学、术

科训练，一天学习十二小时，我尽心教，学兵努力学，成绩斐然，射击技能显著提高。军士连结业后，我又调长第四连。

是年底，在大雪纷飞的严冬，部队奉命开赴华北参加长城抗战，车到磁州，下车待命。这时我的撤职令追到，全团为之哗然，有人主张应与营长刘××理论。我劝大家安静，表示除对不能参加抗日战斗感到遗憾外，丢官对我来说视若草芥。在我离开磁州时，不少军官及全团军士为我做了几十面锦旗，全团号兵集合，一路吹奏，把我送上火车。我对他们亦很依恋。我回到开封，略事逗留，即携眷返里。

这时，我的人生道路又走到了岔路口。对国民党军队的黑暗，已知道一些，从心里感到泄气；地方行政界，也是同样的黑暗，往哪里走呢？心中无数。正在这时，我最要好的同学章诚公到蚌埠，急电邀我同赴南京，把我介绍到独立炮兵第一旅第一团（旅长史文桂，合肥人；团长李伯庚，云南人），任中尉排长。我考虑到这个旅，炮是较新式的德国造卜福斯半自动山炮，干部的水平较高，学术气氛也较浓，虽然降了一级，仍很乐意。到任后，我很注意德国顾问的讲习，希望增加一些军事知识。

该部成立不久，兵员奇缺，我返乡召集青年五十多名，补充了兵额。马匹也很短缺，团长知我识马有术，又派我到山东购买驮骡。回团分配时，营长彭孟缉、娄少凯都认为价廉质高，颇为赞许。

### 三、讨伐福建人民政府

1933年冬，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。蒋介石立即调动军队，实行镇压。我团第二营由团长李伯庚率领，从南京上

火车运到浙江衢州（杭州至衢州的铁路刚刚通车），而后徒步进入福建。时值春节，天气暖温如春，但沿途多崇山峻岭，语言难通。抵南平县附近，得知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的司徒非师长，率部据守城垣。我带卜福斯山炮两门，向南平西北方高山攀登，路上遇见刘和鼎56师的桂旅长，边走边谈，知道他是六安人，他们的部队曾驻南平多时，地理情况了若指掌。我登上山顶，俯瞰南平城内，街市房屋历历在目。得到桂旅长的指点，心中有了数。乃布置阵地，标定目标，待命发射。这时我才发现，炮弹箱上的符号是练习弹的符号，这样炮弹装药甚少，多以泥块充填。马上报告团长，他看了后只说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事已如此，只好作为射击演习，“真仗假打”。

上午九时，步兵开始攻击，我即发令射击，弹弹命中目标。历时不过半小时，发弹仅三十余发，上级转来消息，说城中的敌人已宣布投降。我们停止射击，仍在山顶监视城内情况。只见城里军人，十个、八个的一阵，正在收集阵亡人员的尸体，排列在河边的沙滩上，也有焚烧纸钱、祭奠亡灵的。我默念着古人的诗句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”，不禁感慨万千。下午二时许，奉命撤出阵地，到南平城内宿营，与上午还是敌人的部队同住一条街，相去咫尺，并共同派出小分队，一道上街巡查。

南平以南的闽江，水势渐大，可通船，但须过一险滩，落差大，船须在大石隙间穿过。我弄到一只120吨的木船，装上炮和弹药，又到县政府找新上任的县长（第56师的中校参谋）代雇了两名梢公，安全渡过了险滩。夜宿船上。第二天抵福州城，稍事休息，去温泉浴池洗澡，身上已生虱子，肥胖透明，

捉置玻璃板上，相视而戏，取乐一时。

在福州停留两天，又经南台向莆田、泉州方向前进。这天快到洛阳桥附近，听见几声轻机枪射击声，未几，传来消息：王作霖阵亡了。王是第六期炮一队的学生，陕西人，因经常在“阵中日报”上投稿，成为军中人人皆知的闻人。毕业后分发到宋希濂部，步步青云。任团长不过一月，就结束了生命。据说是随尖兵连前进，过于突前所致。福建人民政府，没有必要的条件，贸然大举，很快瓦解。

1934年春，我们从泉州的秀涂登船回南京。上船时，发觉一个士兵被第83师军法处拘押，因他在运送物件上船时，溜到妓院胡闹。我又转回泉州，将他保释，另雇木船，在海湾航行七十多里，赶上了运兵船。海上风浪很大，木船时而被送上浪尖，转瞬又落入浪谷，船工教我们俯卧船上。一米多长的大鱼，不时露出海面，有时离船很近。心中虽有些紧张，但也很壮观。

回到南京，仍住通济门外新营房。得知我连出了个大事故：连军械中士陈菊生，与钓鱼巷雏妓私订终身。伊母坚不同意，临睡时将大门下锁，防其偕逃。陈在半夜用左轮手枪先将雏妓击毙，又举枪自杀。因正值除夕之夜，鞭炮声不绝，枪声未被察觉。天亮后，与陈同去的上士班长张青山开门欲回，因大门被锁不得出，遂发觉惨案。张被警察拘捕，送军政部军法总监部，被判处死刑；留守排长卢凤钱被撤职，都交炮一团执行。不知是谁作主，知道张青山实属冤枉，将他暗中放走，对卢排长也更名留用。

我在这个部队炮兵一旅当排长时，发现每逢星期六下午，连长房间的门、户紧闭，连的上士文书则在门外当游动哨，警

戒甚严。与其他排长谈及此事，他们说是开秘密会。后来知道，这是“蓝衣社”的基层组织在活动，一营营长彭孟缉（武昌人，军校五期，去台后首任参谋总长、驻外使节）乃中坚分子。我认为军中不宜有任何小组织，这些东西将成为派系的根源，为门户私争、自相水火播下种子。

#### 四、在陆军第二师

我回到南京后，与驻在保定的第二师炮兵营的同学虞孝冰（江苏溧阳县人，任步兵副团长时在上海抗战中牺牲）、丁镇东通信，他们邀我到第二师去一同工作。这是第二次邀我，前次因我生病未能成行，这次理当从命。乃于七月请准长假，去了保定。由师长黄杰面试，以上尉副营长任用，主要任务是主管军事教育。我发现有的炮长对射击操作很不理解，甚至有严重的错误，于是常到操场现场纠正，与士兵增加了互相了解，得到他们信任。

1934年冬，到南京炮兵学校上尉班第一期学习，专修炮兵射击，预定五个月结业。教育长邹作华，原是张作霖的炮兵司令。郭松龄反叛张作霖时，邹作华密使炮兵取下炮弹引信，所发炮弹多不爆炸，致使郭迅速失败被擒。

1935年春，日本帝国主义要胁蒋介石把中央军撤离华北。第二师由保定地区移驻徐州，所以我结业时即回徐州，驻铁路东的新营房。

这时南京军政部命令第二师师长黄杰，组织参谋旅行团，到台儿庄周围地区进行地形侦察，同时决定在徐州近郊构筑钢筋水泥工事，积极作抗战准备。乃以上校参谋聂松溪（山东人，陆大学生）为旅行团团长，率几个步兵团副团长及师部两个参谋为团员。临出发时觉得没有炮兵的人员不好，炮兵营就派我临

时参加。在东至沂河、西至运河两岸的苏北、鲁南地区，转悠了半个月。当时我认为我的级别较低，国防知识缺乏，不过是个配角，没有多大责任。不料回到徐州后，聂松溪宣称：“明天上午到我家吃炸酱面，汇报侦察的成果”。我这才觉得倜促，什么记录也没有，明天怎样汇报？于是打定主意，先到街上洗个澡，吃过饭找旅馆住下，开夜车写。我不过是配角，写好写坏关系不大。凭脑子的记忆，赶写到深夜二时许，觉得可以交差了就倒床而卧。第二天到聂家聚齐后，大家谈笑风生，而言不归正传，吃过午饭后，仍不见各人拿出报告来。我不愿再待下去了，就取出报告交给聂，告辞回营。大约三个月后，军政部发下一份代电。我一看觉得熟悉，再细看，原来是我写的参谋旅行团报告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这些人身负重任，中央指令作国防措施，他们竟把我的报告一字不漏地呈复军政部，敷衍了事；而军政部又原文照发，真是太儿戏了。

我的这篇报告，得到师部参谋处的认可。谁知这意外地决定了我“参而又参”，一直参了十二年之久，先后给五位军长当了参谋长。

次年九月，第一连连长丁镇华随黄杰师长到税警总团工作，遗缺由我调充。十月，母亲病逝，返里奔丧。在家守制月余，得营部急电催归，盖因“西安事变”发生，有军事行动。

部队开到潼关下车，部署在大荔县附近。每日看到飞机飞向西安，进行威胁。小道消息，不断流传，南京有主张讨伐的，有主张妥协的。当时盛传张学良无意杀蒋介石，而杨虎城则主张杀蒋。这与以后1949年杨虎城在重庆渣滓洞被惨杀，不无因果关系。盖蒋介石必置杨虎城于死地。

蒋介石在西安被迫应允停止内战，共同抗日，于12月25日

飞回南京。

“西安事变”结束后，第二师从大荔县移驻渭南以北地区。我们的驻地在固市镇，此地为盐碱地，只能种棉花，五谷不生，有水皆苦。居民夏接雨水，冬扫落雪，以供饮用。部队驻此，则以汽车到渭河运水，难供人、马所需。又移驻渭河以南，后到潼关附近。

这时日寇侵略日亟，国人抗战激情大增，部队的战斗准备也自觉加强。射击是炮兵的主要战斗手段。我连的射击技术，尚未臻熟练，除练兵外，还得训练副连长和排长。他们学有心得，求知兴趣高涨。我还每周到师部，对官佐教马术，振作尚武精神，转移打牌风气。军中生活，呈现朝气。我虽是个下级军官，颇得师部官佐的称许，这也是我后来到师部当参谋的原因之一。

## 五、参加抗日战争

芦沟桥的炮声震撼着神州大地。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，群情振奋，官兵们等待着出发的命令。小道消息很多，时而说将去上海，时而说将去华北。部队把后方和眷属安置在武汉地区，有的夫妻二人在分别时，互相勉励，暗暗立下生死与共遗言，各部都忙于办理开拔的各项准备工作，激昂悲壮的气氛充满每个人的胸怀。七月底，部队奉命登车东出潼关，时走时停。车过洛阳，我们才知道，上面确定部队开往保定待命。

1937年8月5日，全师到达保定附近集结。此时，郑洞国第二师和关麟徵第二十五师合编为第五十二军，军长由关麟徵升兼。保定城区不大，一时大军云集，日寇飞机不断来侦察窥视，秩序很不好。主帅刘峙，颟顸无作为，战前准备工作多有

贻误。稍后漕河（保定北约四十里）一战，溃退数百里，第二师第十一团团团长吴啸亚失踪。

我奉命率全连开赴高阳县（保定东南80里），配属步兵第七团（团长刘玉章，陕西兴平县人，军校四期），构筑工事，掩护保定守军的右侧背。因材料缺乏，抗力不强，工事只是虚有其表。工事刚刚完成，我又奉命开回保定，随全营开赴易县梁各庄，由兵站分监司可庄（曾任第二师少将参谋长）负责向卫立煌联系，打算参加北京西郊门头沟附近的战斗。

卫立煌率第十师李默庵部、第八十三师刘戡部、第八十五师陈铁部，向门头沟开进。经过保定时，借第二师的山炮营暂用。步兵已先期投入战斗，山炮营第一步开到梁各庄，由司可庄的防区处相机加入战斗。因山路崎岖，驮载行进不易，先派第二连向门头沟方向前进。因京西战况变化，卫立煌部全部转向山西战场。

一天上午，卫立煌和参谋长郭寄嶠路过梁各庄，把我找去，由郭写一便条，令炮兵营开到获鹿县李庄（娘子关外）附近集结待命，并通知滹沱河渡河指挥所，让炮兵营优先渡河。我们到达李庄后，转乘火车，开到太原以北黄土岭车站下车，投入忻口战役。

十月初，炮兵营在刘庄以北进入阵地，归八十三师师长刘戡指挥。开始几天，敌我双方都在构筑工事，战斗不甚激烈，略呈对峙局面。接着火力逐日加强，炮战时起时伏。我方炮兵处在明显劣势，炮弹的补充尤为不足，全营每天最多五百发，少则二百发。所幸得到晋军炮兵的支援，将炮弹送给我们。开始，敌炮命中我阵地时，阵地上要求我暂时停止射击。我未允许，告诉他们：“敌人看不见我阵地，我继续照常射击，敌人就